1935年10月15日是巴克禮來台傳教六十週年紀念日，當信徒們決定盛大慶祝的前十天，10月5日上午12時2分，巴克禮來不及參加盛會便辭世了，享年八十六歲。

2. 巴克禮與教會羅馬字

基督新教爲了傳教的目的，非常注重當地信徒母語的研究，替各國語言或方言創制羅馬字拼音文字，以便翻譯聖經及傳教文字。這個傳統自宗教革命以來便如此。和馬丁路德同稱宗教革命領袖的厄拉斯姆斯就曾說過：

「所有信徒都應該用他們的母語讀聖經。爲了讓那些目不識丁的農夫，拿著鋤頭想起聖經的句子，掘墓的土工仔一面勞動一面從聖經的話得到慰藉，聖經一定要譯成他們的母語。」⑤

散佈於全世界的傳教士學習各地語言，編字典、教科書、譯聖經、寫傳教文字，爲人類留下實貴的語文遺產，莫不是由於這個信念。由此看來，巴克禮編《廈英大辭典補編》、翻譯新舊約聖經，雖然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卻不是很特殊的貢獻。

西洋傳教士替各地製訂的羅馬字後來往往變成正式文字。有時候甚至取代傳統的文字變成一種新文字。法國佔領安南之後以羅馬字取代傳統漢字與字喃並用的安南文便是一例。不過在原來使用漢字而未淪爲西方殖民地的中國、朝鮮、日本，羅馬字的推行便極爲困難。羅馬字頂多只是少數基督教徒爲信教目的而採用的輔助文字而已。

但即使是這種有限的功能，各地推行的成敗極不相同。台灣地區可以說是教會羅馬字推行最爲成功的地區。台灣老輩的長老會信徒幾乎人人能讀教會羅馬字，教堂裏，信徒們一起閱讀羅馬字聖經，一起合唱讚美詩，即使目不識丁的農夫，都能夠用羅馬字寫信給遠方的兒子，透過羅馬字，知道世界上更多的事情，這種成績無疑地應歸功於巴克禮的提倡。萬榮華在他的大著 "Barclay of Formosa " 中，記錄巴克禮的話說：

「從我初抵台灣，就確信三件事，至今歷五十年仍堅信不移第一、若要健全而有活力的教會，每一位信徒不分男女都要研讀聖經；第二、這個目標使用漢字是達不到的；第三、使用羅馬拼音的白話字可達成這個目標。白話字很適合婦女、兒童，及未受教育的人們的使用；讀書人只用漢字，就是對白話字的輕視。因此我決心以身作則，用白話字代替漢字。我一生中只有一次用漢字聖經講道，我爲那一次感到遺憾。我當然知道，只用白話字會被人誤爲不學無術，但想到可能帶來的利益，我就不在乎了。」⑥

巴克禮實際推動白話字最重要的工具除了白話字聖經、聖詩的翻譯之外，當推白話字教會報的創刊。1885年7月巴克禮創刊《台灣府城教會報》（Tai-Oân Hú-siâⁿ Kàu-hōe pò），即《台灣教會公報》的前身。這個羅馬字報紙一直延續到1969年3月第1049＋1050合刊。前後共84年之久。

《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詞很顯然出自巴克禮之手。詞曰：

「你們自己讀聖經，會受聖靈感動，雖然沒有人講道給你們

聽，仍然會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惜漢字很難學，會讀的人少，因此我們另行設法，以白話字來印書，使你們較易看得懂。我們最近在府城設備了一座印刷機，可印這種讀物。希望眾人要努力學習白話字，以後我們若印什麼書，你們都可看得懂。不要以爲看得懂漢字就可以不必學白話字，也不要看輕它，以爲是小孩的玩意。兩種字都有用處，不過因爲這種白話字易學易懂，因此人必須先學它，以後如再讀漢字更妙，但是要先學白話字，以免因爲不懂白話字而讀不懂我們以後所印的。勸你們眾人、信徒、道友、男女老幼、識字或不識字都趕快來學，這樣以後你們就會讀報以及其他的書和聖經，希望你們習道愈深，德性愈完備。」⑦

自創刊號起的前幾期，連續刊出五篇從各地牧師、信徒應徵、用白話字所寫、討論「白話字的利益」的得獎文章。得獎者廈門三名、府城一名、小溪一名。他們一致的結論是用白話字來傳教比用漢字優秀，沒有白話字，讀得懂聖經的信徒必然會減少。

萬榮華說：

「本來宣教師之間也有反對用羅馬字寫台灣話的，巴克禮博士獨排眾議，堅決主張並實踐教會的羅馬字教育。今天台灣的信徒宗教上、道德上的覺醒，不能不說是巴克禮博士羅馬字教育之所賜。……」

「請比較中國大陸不用羅馬字的基督教教會看看，台灣的信徒不是進步太多了嗎？這是巴克禮博士最喜歡用來反駁輕視羅馬字教育者的話。」⑧

巴克禮提倡羅馬字教育的業績可能早就流傳於外國。1895年

台灣割讓日本，日軍登陸台灣，10月26日巴克禮開城迎日軍的事前面已經提過。應該是27日，後來擔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的伊澤修二隨著樺山總督進了台南城，求見巴克禮。巴克禮原本是劉永福的同情者，他以爲伊澤是特務，因此拒絕會談。伊澤說：「牧師的教育事業我們在日本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是親身來求教的。」巴克禮才答應會談。

兩人談到今後台灣教育語言的問題，伊澤認爲台灣既歸日本統治就應用日語教學。但巴克禮期期以爲不可。他說：

「用日本話來教育台灣人不是上策。長老教會最初也用英語教育，但是太困難了。不僅如此，好不容易排除萬難教出來的學生，剛懂得說一點英語，就討厭起宗教及教育方面的事，去從事世俗的茶商夥計或通譯去了。因此我們充份認識到用英語教育的困難。於是宣教師決定學台灣話、用台灣話來講道、教育。初抵台灣的宣教師先讓他們學習一年半載的台灣話再去講道。」

「還有，台灣人的教育，用漢字來教台灣話十分困難，我們用羅馬字編教科書，教羅馬字寫的台灣話。」

「所以我認爲用日本話搞台灣人的教育不會成功，並且最好用羅馬字寫台灣話文教育台灣人。」⑨

但是伊澤仍堅持採用日本語，說：

「實驗兩三年，你便知道我的意見是好是壞了。」

伊澤的教育方針有一個强烈的目的就是要同化台灣人爲日本人，因此當然無法接受巴克禮用羅馬字台灣話文教育台灣人的主張了。並且伊澤本人也是一個漢學家，他曾著有《日清字音鑑》

，他確信中日同文，用漢字教育台灣人必會成功。

儘管如此，伊澤擔任學務部長，甫上任（明治二十九年，1896）即下令神津仙三郎編纂日台對照辭典，後來由小川尚義接手完成《日台小辭典》（1898）、《日台大辭典》（1907）、《台日大辭典》（1931-1932），並在 1913年以前以日語、台語對譯的方式教日語⑩，我想這一連串的政策多少也受到巴克禮的啓示吧。

這些辭典、教材採用總督府設計的假名符號注漢字音，而不是羅馬字。但是實驗結果相當成功。伊澤不久辭去學務部長職，明治四十一年（1908）來台參加鐵路開通典禮時順道訪問巴克禮，不巧巴克禮返英休假而不遇。伊澤交待一名叫細川的人說：「等巴克禮牧師回來，問他：「國語（日語）教育收到輝煌的成果，他有什麼意見沒有？」到底細川有沒有去問巴克禮，文獻不足徵，不得而知。

1931年巴克禮在廈門譯成舊約聖經回到台南之後，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國府種武教授，爲了寫〈國語教育在台灣的展開〉一文，走訪巴克禮，向巴克禮請教「對台灣人子弟進行國語（日語）教育」的看法。巴克禮回答說：

「我不能不承認國語（日語）教育的成績，不過我仍然不能放棄以羅馬字台灣話進行教育效果最佳的想法。」⑪

對於這個回答，國府種武認爲「巴克禮是老頑固，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巴克禮過去認爲日語教育必歸失敗，而今卻不得不承認用日語教育的成績。如果伊澤知道這一席話一定是十分高興吧。只可惜巴克禮當時已經不記得1908年和伊澤修二見面的事。」⑫

持平言之，巴克禮的堅持自有其道理，所謂「國語教育成功」恐怕只是日本殖民地教育家的自我陶醉。如果從同化政策的眼光來看，日本治台37年之後的1932年台灣日語普及率才達21.7%⑬，「教台灣人學講日語的成績」可說平平而已，若從台灣人教育的立場，「用日語教育台灣人」那更無何成績可言。巴克禮的本意大概如此，這一點恐怕不是日本殖民地教育家所能理解的吧。

總而言之，巴克禮一生中在台灣提倡教會羅馬字教育，不但在教會實踐，並且獨力完成《廈英大辭典補編》、廈譯《新約》《舊約》全書，其功績可謂彪炳了。

3. 從杜嘉德到巴克禮的西方傳教士的閩南語研究

西方傳教士爲了傳教的目的，無不運用其語言學基本常識對當地語言進行研究。不過他們多半沒有經過良好的語言學訓練，現代語言學在當時還不發達，而且西方傳教士的研究著重在實用的目的，而非理論分析。他們的研究結晶可以說是字典的編輯，即詞彙的蒐集。

1973年《廈英大辭典》出版，杜嘉德以當時優秀的語音學基礎，對前人的研究做了一個集大成。

但杜嘉德字典出版之後仍有許多字典陸續問世。這些字典，除了少數和杜典同時出版者之外，差不多都參考了《廈英大辭典